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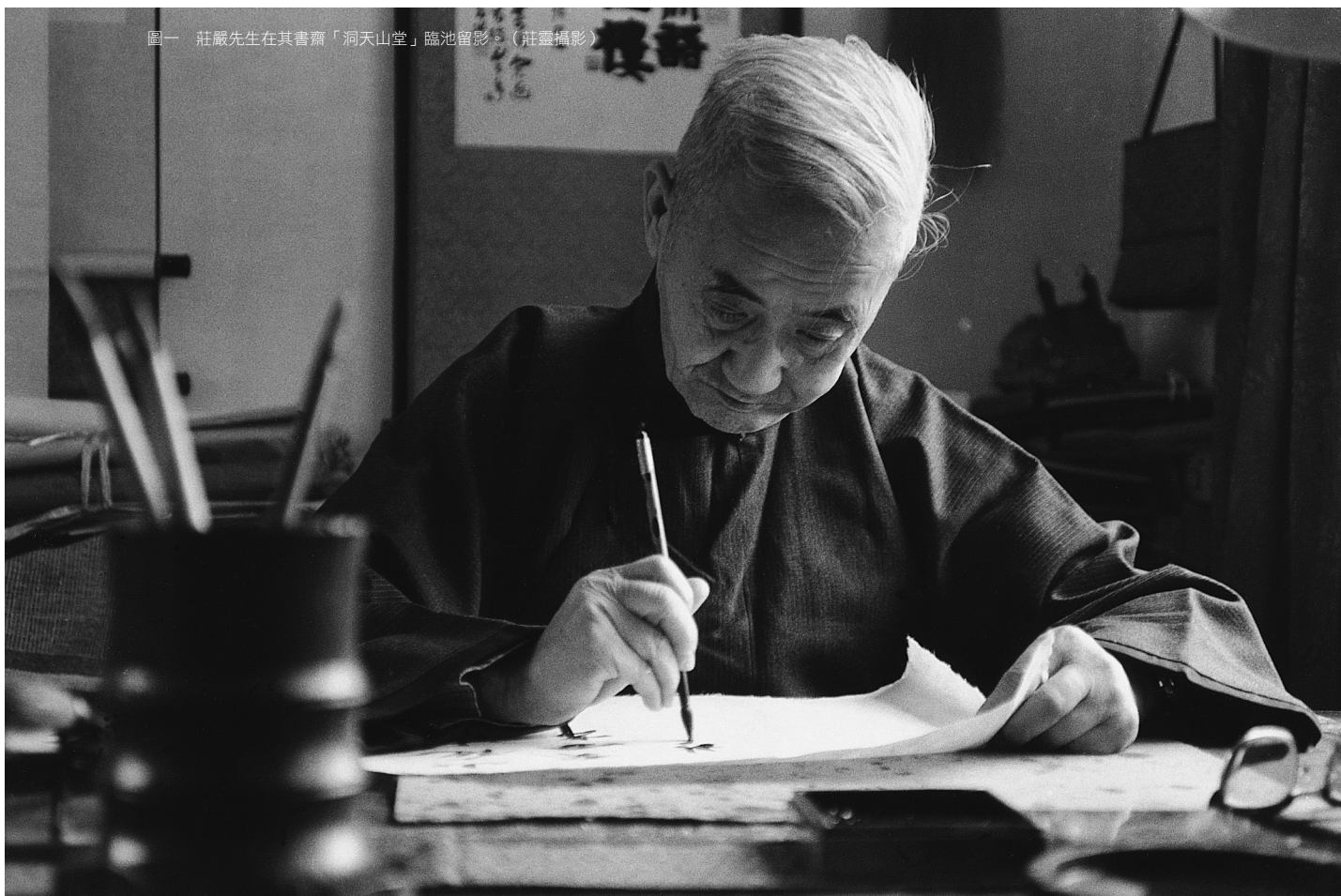
# 莊尚嚴先生二三事

莊伯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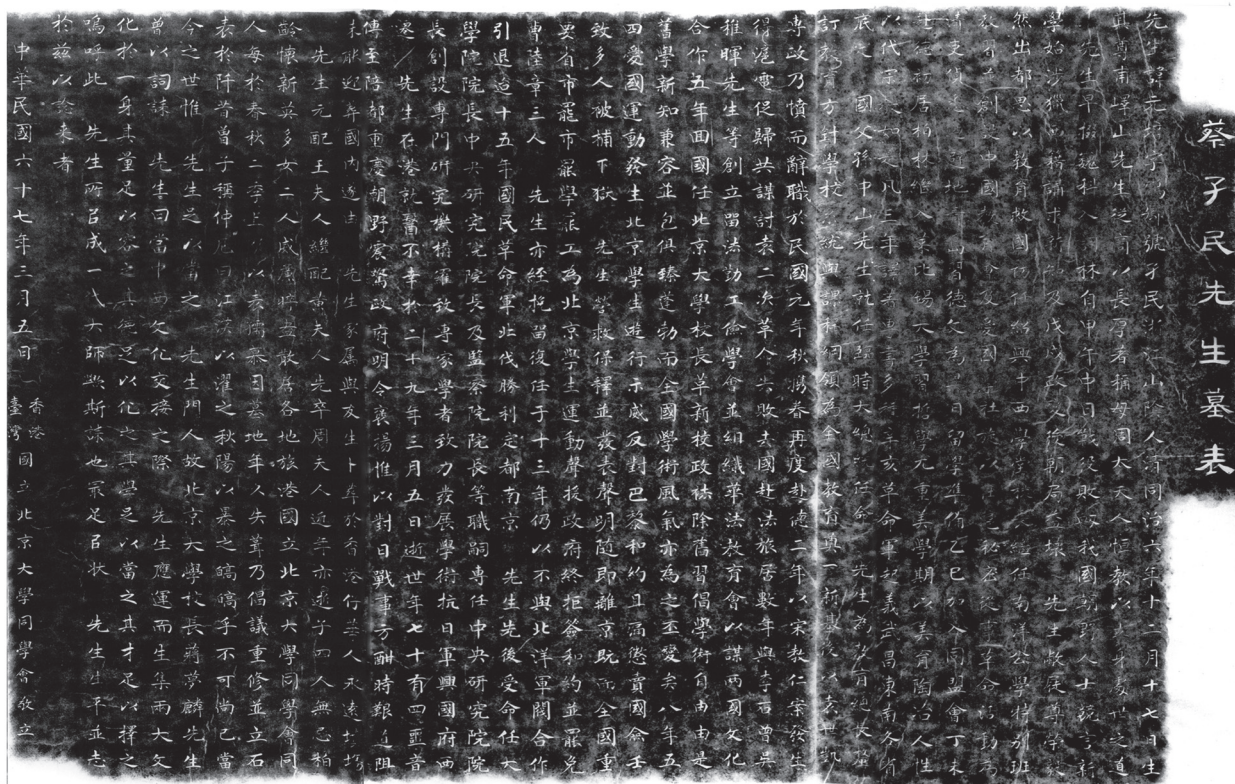
去（民國九十五）年年底，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先生之部分手蹟及收藏，由其三位公子莊因、莊喆和莊靈代表捐贈故宮，時適莊夫人申若俠女士以一百零二高齡仙逝，而先生則逝世後二十七年。

莊嚴先生，字尚嚴，號慕陵，又自號六一翁；原籍江蘇武進，世居北京，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生，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去世。先生以書法名家稱世（圖一），其故宮博物院元老身分、半生伴隨古物遷徙的奇蹟，也為人津津樂道。

先生一生只有一個職業，從民國十三年自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進故宮博物院一直至民國五十八年退休，前後達四十五年之久；這其間除民國十七、十八年曾兼任古物保存委員會北平分會執行秘書，民國十九至二十年之間參加燕下都考古發掘外，都在故宮專心工作。民國十三年先生自北大畢業後，原在母校國學研究所任助教，同年十一月六日黃郛執政的北方政府逼令宣統出宮，另行成立「清室善後委員



圖一 莊嚴先生在其書齋「洞天山堂」臨池留影。（莊靈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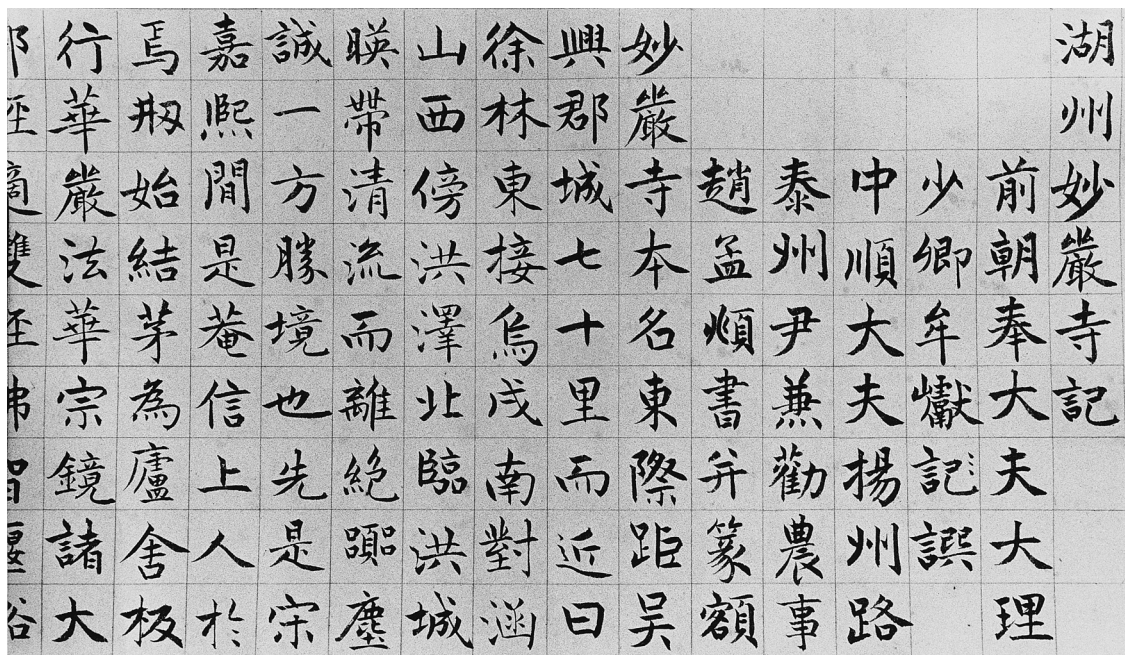


圖二 莊嚴先生書寫的「蔡子民先生墓表」刻成墓園墓碑的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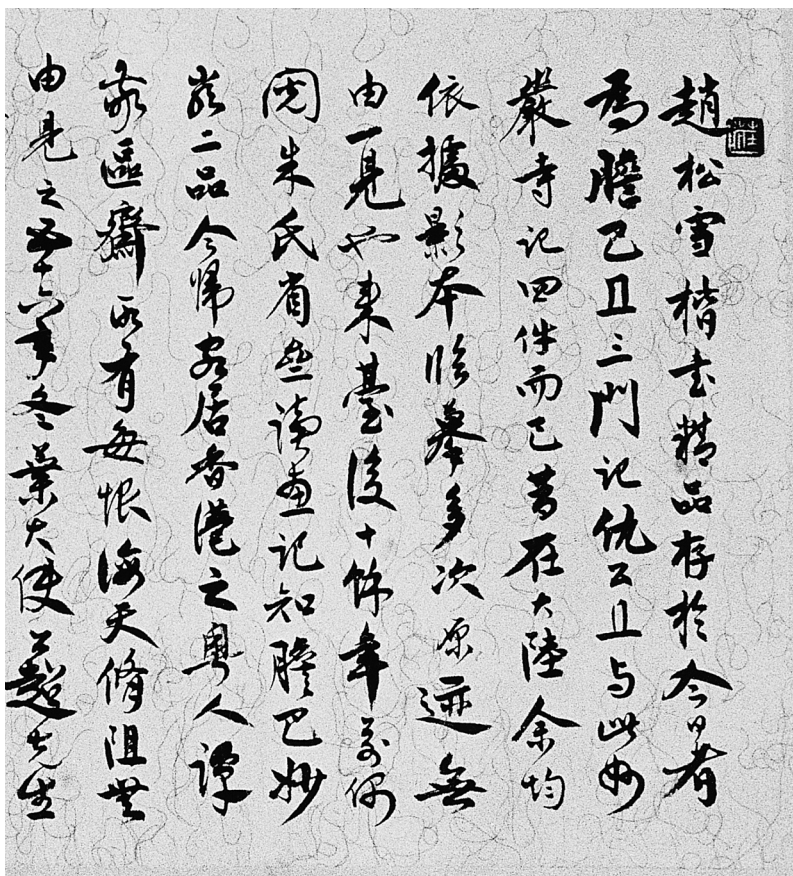
會」，先生與其他三位同學由北大推薦，改到委員會工作，這是他與故宮結緣的開始；原先同人的三位同學如董作賓先生等，都先後離去，只有他始終在故宮服務。

當時先生是以事務員身分擔任故宮文物的點查工作，他曾幽默的說：「宣統出宮，我便進宮，但不是做皇帝，卻是做維護國家重寶的老宮人。」初次入宮由點查文物開始，到文物遷徙、運赴英倫展覽、抗戰時疏散到西南及勝利後遷移來台，其間院中大事小事，先生無不參與。所以故宮掌故只有他最清楚；例如半輩子始終參與、主持古物裝運、搬遷，又不曾出過半點差錯，所以民初大收藏家郭世五先生曾送他一方石印，上刻「老莊老運好」，音義雙關，先生深感榮幸。

對這些事情，先生有留文紀錄，如其《山堂清話》自民國五十八年開始於《自由談》月刊連載，六十九年更由故宮出版，七十四年由日本二玄社



圖三 莊嚴先生臨摹的「趙松雪妙巖寺記」手卷（部分）。（莊靈攝影）



譯為日文出版，以及八十八年雄獅圖書公司出版的先生百年冥誕紀念集——《故宮·書法·莊嚴》等，都可由其了解先生事蹟；而從先生之故舊、好友、學生和家人的記述文章，也有助於了解先生的人格、生活觀、藝術觀甚至書法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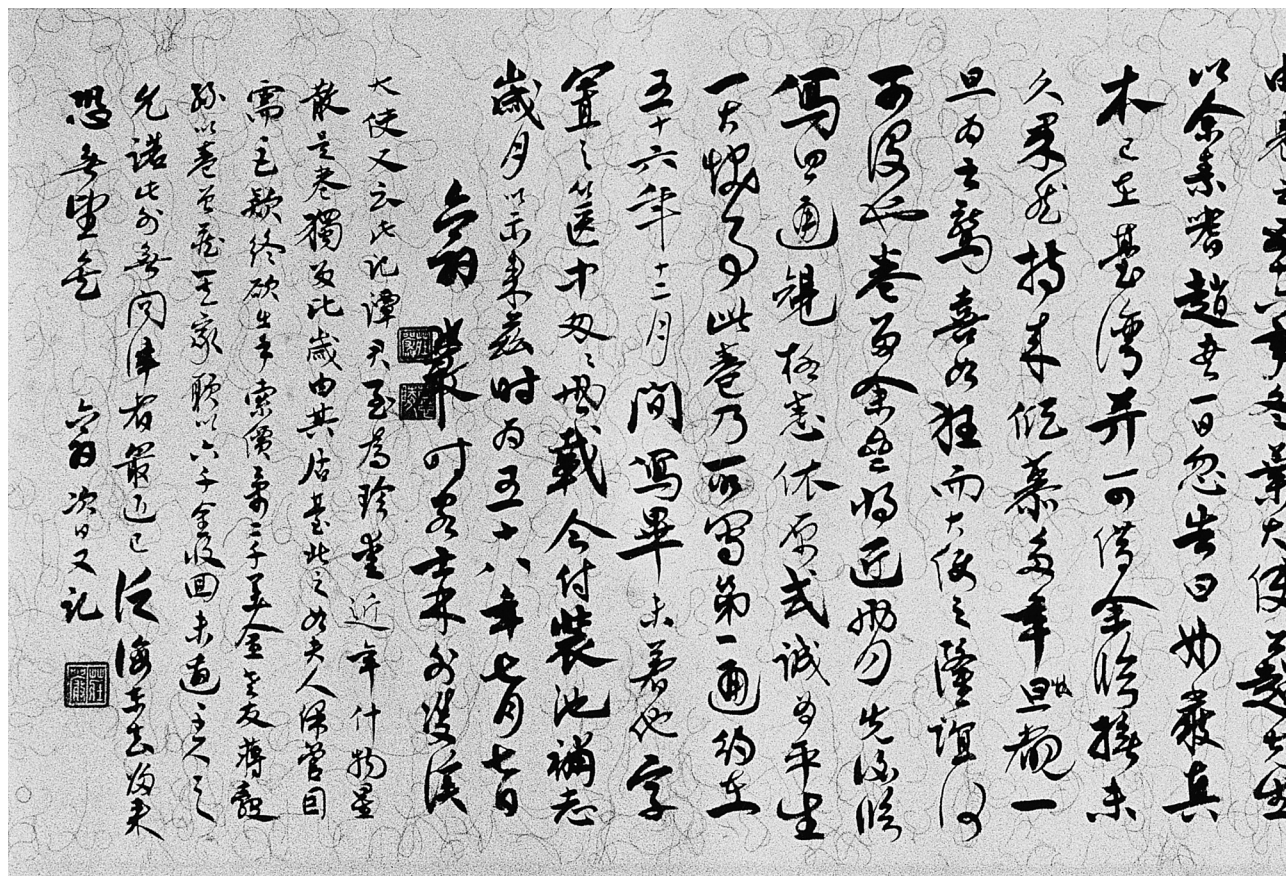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莊因、莊喆、莊靈三兄弟為紀念父親百歲冥誕，安排了再走一趟五十

餘年前兒時隨父親護寶跋涉的舊路，公共電視特別派出一組工作人員拍下這趟從貴州、四川到南京等地，見證抗戰時古物南遷的種種歷程，製作了一部名為「重返歷史現場」的節目。

此次捐贈文物初步登錄雖共編八四號，實際件數不止於此（如「好大王碑墨拓本」，只一個號碼，卻有十六幅），

其中多數為在大陸時期所集之拓片，分畫像、石碑、墓誌等，可由此了解先生過去研究蹤跡；先生手蹟有二十件，包含各種書體，已能全面觀照先生書法風格，尤其「蔡子民先生墓表」（圖二），以先生最得意之褚體楷書精心書寫，堪稱重要代表作；此為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應北大台灣校友會之請，為該校故校長蔡元培先生而作，次年鐫刻於在香港重建的蔡元培墓園墓碑，先生引為平生快意大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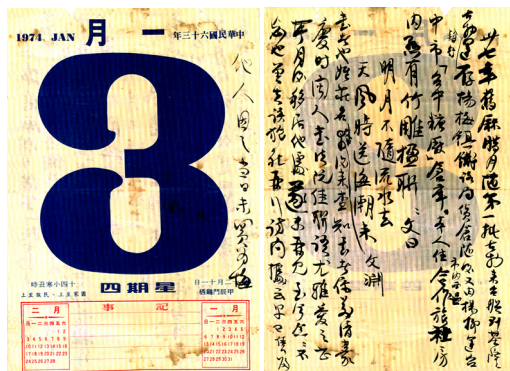
先生臨「趙松雪妙嚴寺記」（圖三），在近代書法史上實值得記上一筆；先生向來喜歡趙孟頫楷書，其存世精品膽巴碑、三門記、仇公碑、妙嚴寺記，先生昔在大陸均依據影本臨摹多次，唯以未見原蹟為憾。民國五十六年，葉公超先生特別將其友人所藏「妙嚴寺記」借給他，提供臨摹，借期長達兩個月之久，先生驚喜如狂，日置案頭，潛心專力，先後臨寫四通，規格悉依原式，自謂：「誠為平生一大快



圖四 莊嚴先生臨摹的「趙松雪妙嚴寺記」手卷跋文。（莊靈攝影）



圖六 莊嚴先生與其收藏的「好大王碑」原拓片。(姚孟嘉攝影)



圖五 莊嚴先生在民國六十三年的一月曆上，記寫他於三十七年和古物剛到台中，暫住在合作旅社時看到一幅莊文淵竹雕楹聯後，念念不忘的經過。

事」，後來雖有機會入藏，卻苦無經濟能力（圖四）。此卷初步登記為「民國江兆申畫六一先生臨池圖莊嚴臨趙松雪妙嚴寺記」，其實先生臨後兩年始付之裝池，並請孔德成先生為題，江兆申先生（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為畫，為先生畫下生活紀錄，在江先生作品中亦甚難得。

先生於文物收藏，不僅興趣濃厚，範圍也廣，對於過眼、心儀卻未能到手之物，常

念念不忘，有一事可以為證，在一張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三日的日曆紙上，先生用毛筆寫著：「三十七年舊曆臘月隨第一批古物來台，船到基隆，古物暫行運存楊梅鎮鐵路局貨倉，隨後又由楊柳（梅）運台中市『台中糖廠』倉庫，本人住市內西區合作旅社，房內懸有竹雕楹聯，聯文曰：明月不隨流水去，天風時送海潮來。書者也姓莊，名文淵，後來查知書者係前清嘉慶時閩人，書法既佳，聯語尤雅，愛之甚。一個月後移居他處，遂未再見，至今念念不忘。也曾去該旅社再行訪問，據云早已售歸他人，因之當日未買為悔。」（圖五）雖是隨手記下的隻紙回憶，卻生動地表達了先生的性情，對於二十多年前失之交臂的文物，一直耿耿於懷。

又如有一回，約民國六十三、四年間，先生看中了台北牯嶺街某舊書店的一本袖珍本日文《和漢三才圖會》，但店老闆素以刻薄有名，先生為此還價不成，空手而回；日

後仍然惦念在心，終於有一天對我說：「那老闆討厭，我受不了他的氣，還是你跑一趟吧！最好還個價。」待到那書店，店老闆卻抬高了價錢，索價一千四百元（今日思之，依然貴得離譜），而且一毛錢不肯少；等我打電話請示時，只聽得先生說：「唉，就咬緊牙根買下吧！」

所以後來入藏高句麗「好大王碑」，成為晚年最得意的



圖七 莊嚴先生指導韓國研究生臨寫「好大王碑」。（莊靈攝影）

一件事，也是可以理解的。前述先生臨寫妙嚴寺記後，並不以此為滿足，興趣轉向了好大王碑；臺靜農先生有一段生動描寫：「四十年前，他在北平琉璃廠西門張樾丞的古古堂，看到有正書局的好大王碑，甚為歡喜，樾丞是篆刻家，因請其摹寫碑中的『莊嚴』兩字，製板印作名片，這兩個字直用到現在。前幾年，他聽說台北沈君藏有此碑的舊拓本，於是輾轉結識了沈君，然後商量『割愛』，終於歸了慕陵。此碑未到手前，慕陵為之寢食不安，既到手後，又為之騷動許多日。此碑拓本分裱十六幅，每幅長一丈二尺，慕陵的洞天山堂素壁掛不起，只有每幅攤在桌上欣賞，隨看隨卷，甚是辛勞。友朋自台北來觀者，還得接待酒食，家人不免煩苦，而慕陵大樂。：慕陵既得此碑，臨寫數週，偶作榜書，居然有大王雄風。」（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聯合報》副刊）

按位於吉林輯安的高句麗「好大王碑」，自清光緒

三年重新被發現後，即陸續拓印；莊先生此拓本為許世英（一八七三—一九六四）舊藏，或為清末拓印，軸裝成十六幅，每行由上而下依次剪接，此本為石灰塗附後所拓出，但忠實於原碑，字跡清晰。如果我的記憶沒錯，先生於民國六十四年底入藏「好大王碑」時，似花了新台幣五萬元外加故宮與日本學習研究社合作出版的豪華本《宋瓷圖錄》等書，手頭不鬆，仍然傾力達到目的，否則「寢食不安」，先生之珍愛此碑，可以想見。（圖六）

先生收藏「好大王碑」後，不僅自己樂在其中，甚至提供學生臨摹，國外研究者也聞風而來（圖七）。民國六十九年先生過世後，長子莊申甚至與諸弟立下「好大王碑不出家門」的約定，而今他已去世多年，去年又逢師母申若俠女士仙逝，家人乃決定與其他先生之手蹟、收藏等一起捐贈給他服務一生的故宮博物院，亦可謂得其所哉矣。